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09年第1期
(总第12期)



<http://acs.whhit.org>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Zhongguo Shehui Yuyanxue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09年第1期
(总第12期)



<http://acs.whhit.org>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09年. 第1期:总第12期:
汉英对照/高一虹主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04-028911-4

I. ①中 ... II. ①高 ... III. ①社会语言学-中国-
文集-汉、英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2910 号

策划编辑 贾巍巍
版式设计 刘 艳

责任编辑 谢 森
责任校对 谢 森

封面设计 周 末
责任印制 毛斯璐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总 机 010-58581000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m.com>
<http://www.landra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262 000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8911-00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09年第1期(总第12期)

主编:高一虹 副主编:陈瑞端 谷晓恒 邵朝阳 苏金智

理论探讨、研究综述

- | | |
|-----------------------|--------|
| 语言人文主义思想于当今语言推广之不适用性 | 宫同喜 1 |
| 壮侗语族社会语言学研究概述 | 王国旭 8 |
| 称谓语研究述评——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 | 芮晓松 17 |

语言使用状况

- | | |
|---------------------|--------|
| 新加坡新生代华人语言应用与语码选择调查 | 潘家福 28 |
| 尤溪小称词语法化研究 | 刘秀雪 43 |

语言态度、语言认同

- | | |
|----------------------|--------|
| 宁波市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语言态度比较研究 | 屠国平 56 |
| 普通理工科大学本科生基础阶段自我认同研究 | 战凤梅 73 |

语言与交际

- | | |
|------------------------------|---------------|
| 虚拟社会的求助策略探讨 | 谢佳玲 86 |
| 汉语请求言语行为性别差异调查 | 玉兰 袁文 吴真贞 101 |
| “义素”语言—图像关系模型及其在汉语报纸广告分析中的应用 | 孟艳丽 116 |

新词语

- | | |
|---------------------------------------|-------------|
| 社会语言学视野下的“X门”现象 | 张虹倩 刘斐 138 |
| 英汉网络交际行为对比研究
——基于网络新词和非语言交际手段的个案研究 | 左秀兰 赵永丰 147 |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No. 1, 2009 (Serial No.12)

Editor-in-Chief: GAO Yihong

Associate Editors-in-Chief: CHAN Shui Duen, GU Xiaoheng, SHAO Zhaoyang & SU Jinzhi

Theory and Research Review

- The Inapplicability of Linguistic Humanism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Languages GONG Tongxi 1
- A Review of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on Zhuang-Dong Languages WANG Guoxu 8
- Research on Address Terms: Structuralist and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s RUI Xiaosong 17

Language Use

- A Survey on the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Choice of the Chinese Youth in Singapore PANG Kahhock 28
- On Grammaticalization of Youxi Diminutive Suffixation LIU Hsiuhsueh 43

Language Attitude and Identity

- Language Attitudes of Native and Non-Native Residents in Ningbo City TU Guoping 56
- Self-identity in the First Two College Years: Longitudinal Study on Non-English Majors From an Averag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ZHAN Fengmei 73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 Request for Help in Virtual Society HSIEH Chialing 86
-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Request YU Lan,
YUAN Wen,
WU Zhenzhen 101
- A "Sememe" Model on Visual-Verbal Relations and Analysis of Chinese Newspaper Advertisements MENG Yanli 118

Neologism

The “X-Men” Phenomenon Examined From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ZHANG Hongqian
LIU Fei 13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ZUO Xiulan
ZHAO Yongfeng 147

语言人文主义思想于当前语言推广之不适用性

宫同喜

提 要： 以洪堡特“语言世界观”为代表的语言人文主义思想强调的是“语法结构体现民族的认知方式”，即不同的语言对应不同的认知结构。这种认知结构不是当前各国文化传播的重点。所以，语言人文主义思想不应该作为当前语言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语言对外传播；文化传播；语言人文主义思想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积极对外传播本国语言，这种语言传播政策背后的逻辑是：语言的传播推广会带来文化的传播，其所承载的是价值观的扩展。该逻辑并非是新近的事物。麦考利（Macaulay）爵士在1834年就曾经扬言要通过英语传播培养“既具有印度血统和肤色，又具有英国式旨趣、看法、道德及智能的阶层”（武波，2008：16）。西方知识分子法农（Fanon）评论英语在后殖民地时代的传播时，也指出

说话就意味着可以应用某一语言的语法和词法。但它更加意味着采用某种文化并支持某种文明。（转引自约翰逊，1997：25）

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把语言人文主义思想论断当作自己的理论基础。其思路大致如下：语言人文主义思想提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词汇和个别结构的考察也佐证了语言 and 文化的密切关系，所以可以推导出语言和文化具有同构性。在该思路指导下，人们就会认为，推广了语言也就传播了文化，这是麦考利的角度；如果接受一种语言就是采用某种文化，这是法农的角度。

上述思路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不同场合下“文化”的概念。语言人文主义思想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文化”主要是指不同民族使用语言认知世界的方式，重在表明语言在认识、建构世界中的作用。而当前各国拟推广的“文化”主要是指各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重在增强本国文化感召力，提升综合竞争力^①。而上述论证过程首先把语言人文主义思想中的认知结构的范畴扩展为无所不包的文化概念，然后偏离角度指向民族核心价值观念。在偷梁换柱的过程中，该论述又杂糅了一些从词汇、个别语法结构出发阐述语言与文化密切关系的佐证，摇身变为政策制定或者大众评判的理论基础。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认为语言人文主义思想无法构成语言对外推广政策的理论基础。我们应该具体地考察在什么条件下，语言传播哪些文化，而不是想当然地断定语言本身的推广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

1. 正确理解语言人文主义思想

语言人文主义思想论述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其论述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个民族的语言结构对应于该民族认知世界的方式。它强调的是语言在认知世界过程

中所起的能动作用。但是,人们经常从词汇或者个别语法结构出发,阐发语言人文语言思想,并有意无意地替换了文化的概念。这种误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误读一:从“词汇反映社会现实”出发论述语言 and 文化的密切关系

洪堡特和萨丕尔都曾指出,“词汇反映社会现实”这一层面无法揭示语言 and 文化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方面出发谈论语言 and 文化的关系,但不应该挂上语言人文主义思想的招牌。

语言是传承文化的载体,服务于所需要表达的内容。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有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正如萨丕尔(1985:196)所言,“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名称;从来没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到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目前,很多关于语言 and 文化关系的研究正是从词汇 and 现实的对应关系出发的。例如,通过汉语中表示亲属等级的词汇系统发达来说明汉民族等级森严,通过爱斯基摩人有上百个关于雪的词汇来说明语言的民族特性。

这种研究对于通过语言了解一种文化有着积极意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通过词汇反映文化来例证语言 and 文化的关系不是当年语言人文主义思想论证的本义。萨丕尔(1985:196)曾指出,“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内容。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肤浅的、外加上去的平行对语言学家没有真正的价值”。对这个问题,洪堡特持类似的观点。洪堡特认为,“语言世界观的不同首先表现为语法的不同。……词汇所反映的对世界的认识始终处在不断的扩大、深化和更新之中,而语法反映的则是一种相对停滞的认识;任何一种语言都能够超越自身词汇的界限,但是没有一种语言能够摆脱自身语法结构的规约”(姚小平,1995:141)。

1.2 误读二:从个别语言结构出发对比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

语言人文主义思想提出了“语言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工具”的观点,并指出不同的语言就对应不同的认知结构。语言结构和认知方式的这种对应关系应该从宏观上把握,而不应纠缠于具体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的一一对应。

关于从语法范畴的运用可以推断一个民族的语言世界观,洪堡特举了美洲印第安语里的一个例子,该语言没有印欧语言通常加以区分的性范畴,却根据“有/无生命”将事物归为两大类,“他们把星辰与人、动物归为一个语法类别,这就意味着,他们显然是把星辰看作自行运动的、具有个性的物体,认为他们可能在天上操纵着尘世的命运”(姚小平,1995:141)。

沃尔夫(2001)考察了英语和霍皮语(Hopi)对时间概念表达的不同,认为英语中的时间、物量名词表达和时态系统都是把持续时间的主观体验客观化。而霍皮语则不使用这种隐喻方法。如果说,欧洲人的语言世界是物化的、客观化的、静置的,那么霍皮语的语言世界是过程化的、主体化的、动态的(参见申小龙,2003)。

语言人文主义思想中关于这种语言结构和认知结构对应的论述是宏观性的,着重点是语言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我们认为,对该论断的理解不应该纠缠于某具体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对应。任何通过某一语法形式的差异推

断民族思维方式差异的做法都假设了一个前提：同样的思维方式由同样的语法形式表现。但是在实际情况下，同样的观念也可以由不同的语法形式表达，同样的语法形式也可以表达不同的观念。如果根据英语中多客体句，而汉语中多主体句来推断英语民族客观思维发达，必须有一个前提，即除了客体句、主体句，没有其他语法形式表达主、客观思维，而这样的前提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从个别语言结构出发论述语言和文化的同构性也是不恰当的。

1.3 误读三：从“语法结构对应于认知方式”推广至“语言和文化具有同构性”

语言人文主义思想强调的都是语言结构和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的紧密联系。如果超出这个范围讨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共同的语言未必产生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文化也未必产生共同的语言（萨丕尔，1985）。

共同语言的存在能为英国和美国在文化上的互相谅解铺平道路，现在是这样，以后很长一个时期里还会是这样。但是，非常清楚，别的因素正在有力地反抗这种拉平的趋势，其中，有的因素正在很快地积累起来。到了文化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决定因素已经不再相同的时候，共同语言也就不能无限期地作为共同文化的印证。（萨丕尔，1985：193）

萨丕尔的考察还表明，不同的人讲同一种语言，而讲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分属不同的文化。以居住在加利福尼亚西北地区的呼帕人为例，他们有着自己特殊的文化，但是和狩猎文化的鲁丘克斯人、野牛文化的萨尔西人、高度礼仪化文化的纳伐霍人使用同一种语言——阿萨巴斯根语。同时，呼帕人、犹洛克人和卡洛克人来往频繁，在共同行动、感情、思想上非常一致，但是他们的语言不仅不相通，还分属于三个主要语群（萨丕尔，1985：191-2）。

如果说，通过语言人文主义思想的论述可以推导出语言和文化具有同构性，那么，这个“文化”的疆域应该划定于“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不应该是广义的包罗万象的文化（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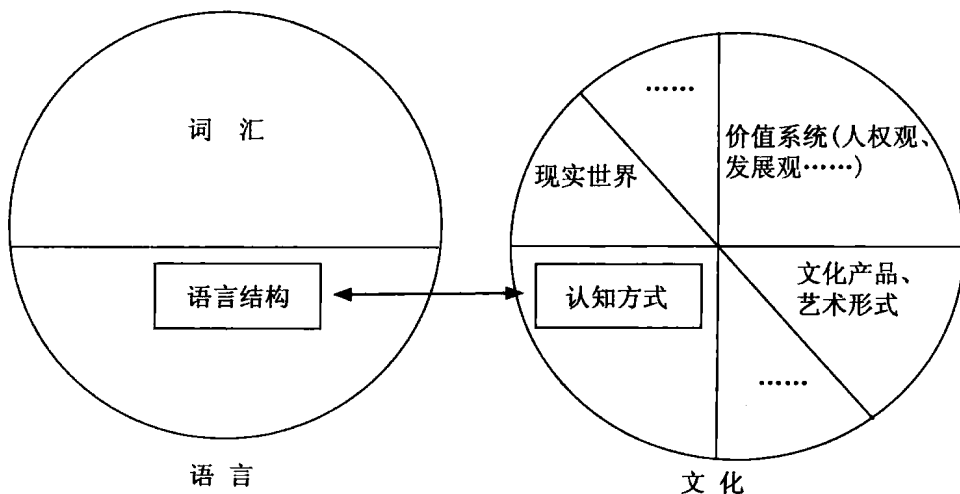


图1 语言人文主义思想中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而人们在对语言人文主义思想的解读中,有意无意地把认知方式的范畴扩大为无所不包的广义的文化,从而得出特定的语言对应特定的文化的结论。在此框架下,语言和文化融为一体,推广语言也就必然能推广文化。如前文所述,这种论述的根本错误在于,扩大了语言人文主义思想中文化的范畴。我们认为,如果一定要借用洪堡特的理论,其结论也应该是推广一种语言结构就能推广该民族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与广义文化范畴内的其他组成部分,如价值系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2. 语言传播与文化传播

在第一节中,我们证明了从语言人文主义思想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传播一种语言结构就能传播该民族认知世界的方式,而我们认为,从各国文化推广的目的来看,人们通过语言传播主要想要推广的并不是这种认知世界的方式。

2.1 各国想要传播的主要是价值观系统为主的文化内容

认知世界的方式不是各国传播的重点,而且和传播的重点也不具有统一性。文化传播的目的主要是追求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与文化感召力,同时促进国际文化多元化,加强文明间的对话,以减少偏见,消弭误解,为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章新胜,2005)。国际交往过程中,误解和冲突在很多情况下源自于价值观系统的差异。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们以本民族的价值观标准衡量、评价其他民族人们社会行为的对错、文明程度的高低,进而做出相应的判断。为了消除误解,避免冲突,培养对其他民族独特的行为方式、价值标准的尊重,我们需要了解其他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宗教观念、人权观等内容,也需要积极主动地对外介绍、推广本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等内容。这些价值观相关内容与哲学层面上的认知方式未必一致,与语言结构也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结构系统和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系统并不具有统一性。通俗地讲,使用相同语言的人们可以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宗教信仰等文化传统,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可以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是说语言对于价值观的传播不起作用。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传播有利于人们了解该语言的文化,打开了一扇朝向某种文化的窗户。通过掌握一种语言,人们可以更方便地了解该语言背后的文化,当然包括价值观。但语言不是文化本身,也不是价值观本身。第二,我们说语言传播价值观,主要是指语言承载的内容而言,即在语言传播的过程中,通过语言诉说的材料介绍或者推崇某种价值观,从而达到推广价值观的目的。我们讲英语的传播导致了“文化殖民”主要是指在英语的传播过程中带来了英语民族价值观念的传播,而不是指英语语法结构对应的认知方式的传播。

2.2 外语语境下认知方式的传播

如果我们暂时假定语言结构对应的认知方式是各国推广的对象,或者说尽管它不是推广的对象,但是和想要推广的对象(价值观系统)具有统一性,那么这种认知方式在外语语境下能够多大程度上发生作用依然有待于探讨。

每种语言都对应着特有的认知方式,掌握一种语言就能了解这种认知方式。但是外语学习者,特别是成年人,大多已经通过自己的母语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世界观。当外语对应的这种认知方式遇到母语形成的语言世界观,两者会如何相互作用呢?英国人学习了霍皮语以后是否就不再把主观经验客体化了呢?至少,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定学习一门外语就会放弃原有的认知方式而采用外语承载的认知方式。诚然,学会一种外语就意味着在业已形成的世界观的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立足点。但是,人们会不会是把自己原有的世界观,甚至语言观带进了一种陌生的语言呢?我们倾向于认为,谈论语言结构和认知方式的联系在母语语境下比在外语语境下更適切。

3. 对现实的启示

在语言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应该既定目标,具体分析我们需要传播的文化,并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推广。同时,对其他外语的传播保持正确的态度,积极吸取外来文明的精华。

3.1 汉语对外传播中加强文化传播的两点措施

第一,增强文化传播的意识。有专家提出对外汉语推广要入境随俗,融入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针对不同背景的国家,编写不同的教材。我们同意这种观点,但我们同时认为,如果汉语传播具有文化传播的目的,那么这种入乡随俗就要找好一个平衡点,既要入境随俗,融入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提高语言传播效率,又要保证有效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明。在文化传播的视野下,汉语推广只是传播文化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以传播文化为既定目标,我们就不能以手段为目的,单纯为了推广汉语而推广汉语。

第二,重视文学、艺术在传播文化过程中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之前,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主要是指文学、艺术等内容。在我国,早些时候很多外语系最初都称为“外国语言文学系”,外语专业称为“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由此可见一斑。20世纪80年代,随着交际法语言教学的盛行,外语教学中的“文化”一词更多地被理解为本族语人的举止、饮食、谈吐、居住等生活方式,以及其风俗、信仰等内容。这些方面的内容主要是用以满足日常交际和生活实际需要,而在构建民族形象方面,19世纪语言教学中强调的文学和艺术等内容,则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3.2 对外语传播的态度

语言和价值观念等内容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没有必要对英语等外语的传播反应过度,指责其为文化殖民的工具。理论上,我们一来无法证明特定文化与特定语言的一一对应,二来无法证明语言的工具属性和认同属性不可分割。实践中,过多指责外语传播将很难解释我们全民学英语以及我们政府推广汉语的努力。我们的观点是,外语学习者,如果愿意,则有能力把外语的工具属性和它的认同属性,即其承载的文化,分离开来。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在港、澳、台等地,英语显然用得较多、较广泛,但中国传统民间习俗似乎也保存得较多。

同时,我们在外语教学中应该避免对外来文化过度推崇的倾向。近年来,我们的外语教学十分重视文化教学。教师将外语文化教学贯穿于阅读、口语等各种教学活动中,丰富了教学内容,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受到学生欢迎。但是,如果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具有异域风情的举止、谈吐以及生活方式着墨过度,给予过高的赞誉,不能引导学生做出客观评价,那么带来文化殖民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我们的教学。如王菊泉教授在《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的序言中所感慨的,“……以学习地道英语的名义,自觉不自觉地西方文化摇旗呐喊,不加批判地宣扬西方的价值观,……那岂不是莫大的悲哀”(蔡永良,2007:序言)。

4. 结语

语言人文思想从语言结构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出发,探讨了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关系,其所指的“语言世界观”和各国政府拟通过语言传播的价值观念并不一样。语言结构对应的认知方式并不是文化的全部,我们也无法根据语言结构和认知方式的这种对应推导出“特定的语言对应特定的文化”,进而利用语言人文主义思想作为语言传播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语言工具属性与认同属性的可分割性,考察在什么条件下,语言如何传播文化,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而不是单纯地希望语言本身的推广能够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

附 注

- ① 各国对外推广文化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强调英语等语言的传播为“文化殖民的工具”,此处我们暂不作道德上的考量。

参考文献

- 爱德华·萨丕尔 1985 《语言论》,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本杰明·李·沃尔夫 2001 《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高一虹等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蔡永良 2007 《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申小龙 2003 《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武 波 2008 英国,载张西平、柳若梅编《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15-57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姚小平 1995 《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约翰逊 1997 政治变迁与英语国际化——关于语言规划、政策制定和英语教学的若干启示,王平译,《全球教育展望》第三期,24-29页。
章新胜 2005 加强汉语的国际传播 促进多样文化的共同发展,《求是》16,45-48页。

The Inapplicability of Linguistic Humanism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Languages

GONG Tongxi

Abstract The humanistic approach to language studies, as of Wilhelm von Humboldt, stresse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anguage structure on the one hand and cognitive style or structure of a people on the other. However, such a cognitive structure is not the foremost influence governments endeavor to exert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dissemination. Therefore, such a theory of linguistic humanism should not be adopted a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language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languages; culture dissemination; humanistic approach to language studies

(宫同喜 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

壮侗语族社会语言学研究概述*

王国旭

提 要: 壮侗语族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前,取得的成果比较有限,学者们主要集中于民族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的视野开阔,学界在语言影响、语言濒危、跨境语言、语言规划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关键词: 壮侗语族; 社会语言学; 概述

1. 引言

壮侗语族诸语言地理分布线长,东起我国海南岛,西达印度的阿萨姆邦,横贯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在我国境内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贵州、湖南、云南等省区。50年代,我国学者罗常培、傅懋勣(1954)认为分布在中国境内的壮侗语族包含以下语言: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仡佬语、水语、毛南语、拉珈语、黎语。

我国学者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源远流长,其中涉及到少数民族语言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方言》、《尔雅》、《诗经》等典籍中。时至近代,李芳桂、罗常培等著名语言学家曾到云南、广西、贵州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他们除了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对民族语言作描写分析外,同时还关注语言与社会、文化、民俗、经济等方面的相关内容。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结合民族识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语言调查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为壮、侗、黎、布依、哈尼、苗、佤等十个民族创制了拉丁字母的新文字,为景颇、傣等民族改进了文字。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美国建立,于80年代初引介到我国,并迅速应用于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取得了恢宏的成果。因此,从发展历程看,我国本土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尽管没有冠以“社会语言学”之名,但所关注的某些问题(如语言影响、借词、文字创制等)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谋而合,在调查研究方法(田野法、访谈法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的实证路径也趋一致。为了让读者对所述领域的研究有一个重点的、发展的了解,本文将以社会语言学登陆中国的时间为界,侧重于介绍20世纪80年代以来壮侗语族的相关研究。

在我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主要指从语言功能的角度出发,研究语言与社会结构的共变关系(戴庆厦,1993),具体包括语言影响的研究、语言变异的研究、语言濒危的研究、跨境语言的研究、语言规划的研究等。

* 非常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作者在此基础上做了修改,并承诺文责自负。同时,作为综述性的文章,本文参考了许多前辈时贤的论文,在此表示深深的谢忱。

2. 语言影响的研究

壮侗语族关于语言影响的研究在我国开展的较早。由于汉语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充当着通用语的角色,并对这些民族语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大多数论文都阐述这一语言现象。张均如(1988)指出平话对广西境内的壮侗语族诸语言曾有过巨大的影响,当时平话是广西各民族之间的主要交际用语,对这些民族语言的发展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明清以后,平话的社会功能逐渐被西南官话和白话所代替,因而平话使用范围缩小,它的重要性也大大减弱。现在广西大多数地区民族语言中的新借词均从西南官话吸收,平话势力进一步削弱。郑国乔(1980)认为仫佬族是一个双语的民族,大多数仫佬人都兼通汉语,仫佬语的音韵系统由于吸收汉语借词而增加了新的声韵母,词汇中吸收了相当多的汉语借词,包括许多汉语虚词,语序也受到汉语影响。符镇南(1990)描写了一个黎语的方言岛——那斗话的语言概况。作者指出那斗话是一种严重受汉语影响的黎语方言。

当然,语言影响是双向的,汉语在对壮侗语族的语言产生影响的同时,也间接地吸收了许多民族语词汇。壮侗语族对当地汉语方言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地汉语各语言要素出现壮侗语化。其中,李锦芳(1990a, 1990b)谈到壮侗语的影响是造成粤语在汉语群方言中地位独特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说明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不仅仅在语言系统的词汇层面,也可能发生在相对稳定的语音和语法上。金美(1998)结合黔东南史实,运用黔东南汉语方言和苗侗语的语音材料进行声母、韵母、声韵配合关系及声调四个方面的综合对比,指出了黔东南苗侗语对当地汉语方言的深刻影响。姜利芳(2004)探讨了湖南新晃汉语中存在的侗语成分。另一种则以底层的形式存留于汉语方言中,如吴安其(1986)指出温州方言中许多词难以用汉字表示,但都可以在壮侗语族语言中找出与其发音相近、语义相当的词汇。

另外,语言影响也发生在各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尤其是在同一语族内部,这种影响就变得更加直接。刀世勋(1982)说明傣族人民在与邻近的其他民族的交往中,接受了小乘佛教,在梵文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同时为了译写经文,从巴利语中借入了大量的词语,甚至文字的拼写规则,但是这些借词由于是为了满足宗教的需求,如今在傣族口语中已逐渐稀少,从而拉大了口语与书面语的距离。邢凯(1993)通过对壮语和毛南语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壮语在声母的增加、韵母复元音化、具体调值的变化等方面对毛南语所形成的影响。

语言影响的类型具有程度深浅、时间长短、语言吸收能力开放或保守等方面的区别。在当代社会,随着民族的相互接触增多、文化交流加快,语言影响能发生在任何语言之间。建国以来,壮侗语族各语言都或多或少地受汉语的影响,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出现变异的现象得到较好地描写,同时,汉语某些方言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壮侗语族语言成分,各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有利于进一步揭示我国壮侗语族语言的状况。

3. 借词的研究

借词是语言影响的直接产物,对壮侗语族各语言中各种借词现象特点的研究论文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

3.1 对壮侗语族各语支中的汉语借词的描写

一方面,汉语作为一种人口众多,使用范围广泛的主体语言,给壮侗语族各语言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许多文章都分析了壮侗语族中各语言所借汉语词汇的状况。如张均如(1985)分析了近百年来壮语从汉语中借过来表示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词汇。并对这些新借词读音的发展趋势及音译问题进行了探讨。李锦芳(2001)提出了如何区分壮语中已经发生了词义和语法意义变异的汉借词的方法,有利于更深入地认识借词变异问题,也许可以从一个方面推动东亚、东南亚语言语源关系研究的发展。

另一方面,结合传统语文学的研究,许多学者对壮侗语族中的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作了划分和探讨。曾晓渝(2003)讨论了水语里汉语借词的判定,及对借词历史层次的划分。借词读音既反映着被借语言的特征,又必然印有借入语言的痕迹。由于两种相接触的语言在语音单位、音节结构、音系格局以及发展演变等诸多方面有同也有异,因此,有的借词可能反映的是两种语言某个阶段共同的语音特点,有的则不然,在读音上往往受借用语言自身语音特点的制约而发生变异,这是由借入语和被借语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造成的。我们在利用借词了解历史上汉语方音或少数民族语言音类特点以及具体音值的时候,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刘力坚(2005、2006)对连山壮语三千多基本词语进行了考察,运用汉语词汇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析了连山壮语中的汉语借词的构成方式与作用,以及汉语借词如何与壮语本族词构成词汇的结构关系,认为连山壮语在搬借的汉语词语时,在词汇内的积聚和分布既有倾向性又有随机性。汉语借词在改变语义场结构时是以整合的方式进行的,整合的结果会导致词汇系统的变迁,近而影响语言的整体面貌。

林亦(2003)参考了古代文献,对照汉语其他方言读法,认为广西平话中一些与壮语读法相近的词是否为壮语借词尚待进一步的研究。其他研究如曹广衢(1997)对壮侗语和汉语闽、粤方言部分词汇、语法的共同点作比较分析,探讨了壮侗语借词的来源。另外曹广衢(1998、2000)、罗滔(1985)、银云忠(2006)等相关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壮侗语族的汉借词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描写,这些研究对语言接触所带来借词的多样性、变异性及其如何合理看待一门语言中的借词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2 各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借词的描写

受地域、社会、文化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影响也以借词的方式直接呈现。徐世璇(1995)通过对语言材料的分析,从语音、构词、词源几方面对毕苏语中傣语借词的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对傣语借词给毕苏语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论证,提出以借词为重要方式的语言接触关系,是引起一些交错分布的语言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壮侗语族的借词研究,从早期对借词横向的归类描写到对借词历史层次及来源的纵深探索,呈现出了独特的立体型研究范式。

4. 语言变异的研究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异质而有序的组合聚合体,这与同质的语言观相左,因而

研究语言的变异现象,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核心。徐大明、谢天蔚、陶红印(2004:79)认为语言的变异,有的跟地域有关,有的跟说话人的社会身份有关(包括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等),有的跟使用语言的场合有关。

4.1 亲属称谓变异

语言是文化载体,每一种民族语言中的称谓词,都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因而不同的社会文化制度、不同的文化风貌和认知心理,使称谓词包含了不同的语义内容。在壮侗语族各语支中,人们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不同的称谓词。罗美珍(1989)认为西双版纳傣语运用不同的称谓词以表示彼此的地位、辈份的高低,僧俗的差别、年龄的大小和关系的亲疏。解放以后,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些称谓词的内容和使用对象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周庆生(1994、1996)描述西双版纳傣族亲属称谓的引称、对称、排行称、释称、从佛称、还俗称、从妻称、从夫称、从孩称、父母称、亲称、泛称和等级称13种用法。并构建了一个“语言交际变体模式”,引入了“语境”、“语用变体”、“义音转换”、“意义匹配”、“意向推断”和“交际功能”等概念,增强了对亲属称谓交际过程的解释能力。

4.2 人称代词、人称量词使用变异

壮侗语族中,人称代词会伴随说话对象所处环境的变化进行灵活地变换。李锦芳(1995)指出广西西林县壮语的人称代词有21种,使用方式复杂。交际中,人们会因性别、年龄、辈分等的不同选择合适的人称代词,另外不同的语体场合,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异。林亦、唐龙(2007)认为壮语汉达话第三人称代词分类细致,除了有数的区分之外,还针对已婚和未婚条件作出区别。闭克朝(1991)提到壮语人称量词中由于年龄和性别的差异而出现变异的情况,如老年男子主要用laux和goeng,老年妇女则主要使用meh和naiq,青年男子普遍使用boux,青年女子的量词习惯使用dah,中年妇女的量词与老年妇女的量词相同。

4.3 社团变体

语言的行业变体产生于不同的职业、言语社团中,社会语言学把这种基于特定的语言社团的语言变体通称为“行话”。在壮侗语族中,陆桂生(1992)介绍了壮语中特有的,类似于隐语的翻语,壮话称为gangj dauq,也叫做gangj vah fan bonj,壮族称其为“公开的密谈”,与顺语(正常的表达顺序)相对。另外,同一方言在距离很近的村庄之间都带上了自己明显的标记,形成一定的表达差异。班昭(1995),对五龙壮语各个自然村之间的语音、词汇和修辞进行了总结概括。认为由于各个自然村的人口、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群体意识、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对外交往程度、婚嫁情况等不尽相同,故语言的外来影响会造成语言的村落差异。

在壮侗语族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异所涉及的内容丰富多彩,学者们不仅从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对这些变异现象进行了归纳总结,而且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寻找其变异出现的动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